

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马 ——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

李志

Abstract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classical and colloquial literary styles was a major feat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in China. Prominent literary figures such as Hu Shih and Chen Duxiu, who led efforts to lay the theoretical groundwork for a case in the adoption of the colloquial style, and Lu Xun and Zhou Zuoren, who pioneered the use of this style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provided clear repudiations of the classical style. This "contest" was similarly evident among literary circle in Southeast Asia. But, unlike the ranging contest that took place in China that led to the eventual eclipse of the classical style, what transpired in Southeast Asia was a quiet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a drawn-ou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ontending styles. Whether it was the *Xin Guomin Ribao* (*New National Daily News*), the primary force in advocating the colloquial style, or other less confident Chinese press, there was an unwritten consensus in neither opposing one style nor publicizing the other.

A re-examination of this controversy in Southeast Asia several decades after the event reveals that the major players wisely adopted a position of cautiousness and moderation. This led to "colloquial-style" literary writings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25-1933 period, ending in the eventual acceptance of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by Chinese writers in Southeast Asia. This switch over from the old to new style has been significant in contributing towards further developments and literary creations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region.

南洋地区的华文文学（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早已成为今天海外华文文学中最重要的板块和实体之一。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海外华文文学最早的实体出现在南洋地区——它是随着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南洋华文新文学都毋庸置疑地属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国境之外的第一个文学分支。由它开始，随着二十世纪华人移民潮的波及，华文新文学才逐渐遍及全世界。正因为如此，今天，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南洋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出发，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初创时期“文（文言文）白（白话文）之争”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刻的文学、文化、历史、美学、心理等方面的内涵作一番认真而深入地回顾与总结，自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一、“文白之争”与“中庸之道”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同样也是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内容方面，南洋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的五四新文学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

在中国，首先是胡适、陈独秀等人在理论上的号召与鼓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的主要内容之一，都是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其次是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们“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鲁迅语）的创作实践：〈狂人日记〉、〈药〉、〈孔乙己〉以及周作人的散文，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新诗，等等，加上《新青年》杂志上刘半农一手导演的《复王敬轩书》的双簧戏，使得守旧势力的文学语言——文言文，在新文学阵营的有力冲击之下，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从此确立了文坛上白话文的一统天下。

而在当时南洋，情况却远不是如此。文白之间的斗争，从未像中国内地那样白热化。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等人那样坚定绝决

地反对文言文的态度，绝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学的立场与积极大胆地白话文的创作实践，在南洋地区似乎从未有过。与此相反，在当时南洋，文白之间的斗争，似乎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一次马拉松似的竞赛。从1919年开始，直到1924年底新文学初创时期结束，进入下一个文学时期（新文学的发展期，1925年至1933年）之后，白话文才逐渐确立了其在南洋文坛的统治地位。

最能反映这一文学史实的代表性刊物和人物，当属创刊于1919年10月1日的《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以及它们的主编张叔耐。他所主编的这张报纸，成为当时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运动的大本营。直到今天，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的共识仍然是以这张报纸及其副刊的创刊（1919年10月1日）作为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性历史事件的。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杨松年（1990，页240-241）曾经这样评论过他：

在五四以前，新马报刊的栏位所刊登的绝大部分是旧文学作品，或有一二白话文作品，亦属凤毛麟角。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新文学提倡确曾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反省，然而，在开始的阶段，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虽然支持白话，但采用温和的手法逐步推行。就以《新国民日报》的主编张叔耐处理的态度为例说明，张叔耐精通旧文学，写得一手漂亮的古文，也擅长填词作诗，但他对于白话文，是支持的，所写该报社论，固多古文，亦有不少是以白话文发表的。不过，对这文体的推行，态度相当谨慎。……张叔耐可说是推进新文体的有心人，在所主编的副刊《新国民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努力的痕迹。

作为提倡推行白话文的“有心人”，主编张叔耐在当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中庸之道”。他曾这样表明过自己的心迹：

办报是一件最困难底事，偏于急激，则丧报的灵魂，过于噤讷，则留报的躯壳，不如取中庸之道，较为收效！（《新国民日报》，

1926年9月30日)

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开端，回顾一个世纪之前的南洋华文文学历史，不妨可以这样说，为了在当时南洋地区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张叔耐及他所主编的《新国民日报》确实煞费苦心，殚心竭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上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以张叔耐为代表的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阵营要用“中庸之道”的办法来提倡白话文，决定了当年发生在南洋地区的这场国境之外的“文白之争”，只能是一场持久战，而非中国内地当时那样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速决战。同时也决定了这是一场拉锯战，一场此消彼长、互有胜负，而非一边倒式的强弱立见分明的竞争。请看以下定量分析：

表一：1919年至1924年《新国民日报》发表小说数量及文字性质归纳分析

年份	文言小说 (篇)	百分比	白话小说 (篇)	百分比	合计 (篇)
1919	3	33	6	67	9
1920	5	20	19	80	24
1921	5	20	19	80	24
1922	12	39	19	61	31
1923	2	2	114	98	116
1924	44	51	42	49	86
总计	71	24	219	76	290

资料来源：《新国民日报》，1919年至1924年。

从总体上看，本时期该报共发小说二百九十篇，其中文言七十一篇，白话二百一十九篇，白话小说的比例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进入下一个文

学时期之后，这个比例继续提高，并最终达到了完全白话的程度。与当时中国内地的新文学运动相比，虽然文言小说的比例略高一些（约占四分之一），从文学语言现代化的速度上看，稍稍慢了半拍，但在进入下一个文学时期之后，则基本上保持了一致。

与当时南洋地区的其他报纸如《叻报》、《檳城新报》、《总汇新报》等相比而言，《新国民日报》在提倡白话文方面，是最有代表性，因而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到1923年底为止，《新国民日报》白话小说发表的数量，基本上保持了年年增长的趋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23年。这一年的白话小说数量，竟占全年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全年仅发两篇文言小说。这真是令人吃惊。然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1924年，全年所发的文言小说竟达四十四篇之多，占全年小说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超过了半数。即使在旧文学势力占优势的1920、1921年，也未出现过这样的现象。这真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新国民日报》的白话小说在1924年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倒退？能否也用“中庸”之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因为1923年发表白话小说太多，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因此，1924年要平衡一下，多发文言小说，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大倒退与大滑坡呢？这是笔者愿在今后的研究中努力加以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新国民日报》在当时南洋提倡白话文方面最有代表性，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就当时南洋地区的所有华文报刊情形来看，无论是在提倡白话新文学的创作方面，还是在发表有关理论文章、提倡白话文的使用、进行有关“文白之争”的理论探讨方面，《新国民日报》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都起到了一种率先示范的作用，这是其相对性的一面。在另一面，由于《新国民日报》的带头示范作用，其他华文报刊也逐渐开始使用白话，发表白话文学作品，以至争相效仿，渐成风气。至本文学时期结束之前，南洋所有华文报刊上，刊载白话文学作品已是大势所趋，蔚为壮观。这是其相对性的另一面。

若单就白话新小说而言，无疑还应指出《益群报》在当时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运动中的开山作用。是《益群报》1919年8月16日创刊的《新小说会》，成为南洋地区白话新小说的历史开端。由此而引发了小说领域

内的一场“文白之争”。《新小说会》创刊宣言中即已明确宣布：“体裁是白话体，文言不要。”这在当时南洋不啻是一声惊雷。它比《新国民日报》的创刊，还要早出近两个月。

随后在近五年的创作过程中，《益群报》亦始终坚持了大量发表白话小说。其白话小说的比例，高出于《新国民日报》。这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该报在小说领域内的“文白之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们不妨再看以下的一个定量分析：

表二：1919年至1924年南洋各华文报刊发表小说数量及文字性质归纳分析²

报刊名称	小说数量 (篇)	文言小说 (篇)	百分比	白话新小说 (篇)	百分比
益群报	368	43	12	325	88
新国民日报	290	71	24	219	76
叻报	143	80	56	63	44
槟城新报	370	331	88	39	12
总汇新报	462	409	89	53	11
南洋商报	93	8	9	85	91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叻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益群报》、《总汇新报》，1919年至1924年。

以上表格，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出当时南洋地区各家华文报刊发表小说的“文白之争”概况。

虽然《南洋商报》发表白话作品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一，但考虑到《南洋商报》创刊于1923年9月6日，其时白话文在南洋地区已较为普及，加上该报本身的态度趋于积极，自然也会为白话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

《益群报》的白话小说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八，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数据。它说明，在白话小说创作这个领域内，该报对于南洋文坛的贡献，甚至大于《新国民日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证实了我们以上的论析：《益群报》在本时期白话新小说的创作中，同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益群报》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未能像《新国民日报》那样注重从理论上去阐发、说明白话文的作用，未能在理论上的“文白之争”中，发挥自己应有的影响。虽然从1919年至1924年底，在五年多的时间内，它也先后发表了一些宣传介绍新文学与白话文的文章，但与其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白话小说发表比例相比，它的理论文章却是太少太弱了。因此，从文学语言的“文白之争”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去看，它很像是一位跛足巨人——创作之足强健有力，理论之足却软弱无力。这大大影响了它在当时南洋文坛这场文学语言的“革命”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我们可以称它为当时南洋白话新文学的重镇，却不能称它为当时南洋白话新文学的旗帜，原因正在这里。

本时期的《南洋商报》也具有同样的弱点，也未能更多地从理论上参与“文白之争”的讨论和建树，几乎很少发表有关文化、文学方面的理论文章，更遑论“文白之争”了。

反观《新国民日报》，在当时南洋地区的这场“文白之争”中，它既注重理论，也注重创作；既有理论上的提倡、宣传，也有创作上的探索、尝试。一方面，它有明确的纲领、计划、方针、步骤，在理论上有条不紊地进行宣传、介绍、提倡、讨论，切切实实地解决有关“文白之争”中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在这方面，当年《新国民日报》有关“文白之争”的评论文章、理论文章，是当时南洋地区各家华文报刊中数量最多的，也最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它在创作上精心组织，热情扶植，大胆尝试，勇于探索。双管齐下，相得益彰。

正是经过了这样的比较之后，我们才认为，《新国民日报》在当时南洋地区提倡白话文方面，是最有代表性的，因而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尽管我们肯定这种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时是有所保留的，是相对而言的。

首先是与当时中国内地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相比，虽然南洋地区的白话新文学运动几乎是与之同时兴起的，但无论在规模、影响、程度、深度与广度等各方面，均无法与当时中国内地的那场激烈的文白之争相提并论。尤其是张叔耐等人决定以“中庸之道”的方法作为实现这场文学语言“革命”的主要途径之后，南洋地区的白话新文学阵线，就始终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姿态。无论是当时提倡白话新文学的核心力量《新国民日报》，还是其他各家态度迥异的华文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不对抗、不张扬的做法。类似中国内地《复王敬轩书》双簧戏那样慷慨激昂、大动干戈的对阵场面，在当时南洋从未出现过。一切都是在静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般的过程中渐变式地完成的。

其次，因为采用了“中庸之道”的方法及理论上的低调姿态，只强调对白话新文学的正面建设，很少对守旧的文言文阵线进行批评与反击。在新文学初创时期的五年多时间内，《新国民日报》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有关理论评论文章，但没有一篇属于论战性质。不仅如此，参见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其提倡推广白话文的同时，他们也时时遵循着“中庸之道”的做法，为了平衡或为了平息守旧势力的不满，仍然发表了许多文言文的作品，决无中国内地那样将文言文斩草除根的做法。在进入南洋华文新文学的发展期、白话文已大大普及之后，张叔耐曾经这样解释过他们之所以采取“中庸之道”的原因与苦衷：

办报是一件最困难底事，偏于急激，则丧报的灵魂，过于噤讷，则留报的躯壳，不如取中庸之道，较为收效！但是，处现象底黑暗社会里，全执“中庸”，也不轻易！为什么呢？因为现象底社会，殊无公是公非可言，每每批评一事，利益于甲的反不利于乙，利益于乙的又不利于甲，倘然有一方不利益的，就为那一方面所仇视，所构陷，结果会弄成僵局，在物质上精神上损失也不少（《新国民日报》，1926年9月30日）。

诚如斯言，这种低调（或曰务实）的做法，其好处也许是较有成效地

抑制了守旧势力对于白话新文学的激烈排斥与反抗，或者说较为成功地转移、分散了旧文学阵营对于以白话为代表的华文新文学的敌意与对立；其弊端则是使南洋地区白话新文学的理论基础未能扎实地奠基与夯实，使得文言文在南洋地区始终绵延流行。直到中国内地已基本流行和运用白话之后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南洋，文言文学仍然占据着文坛一角，新旧文学之间在文学语言上的对峙状况，格外地长久，反复与曲折也格外地频繁。

文学语言的革新，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作为思想的物质外壳，文言文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道德与伦理观念的卫道工具和思想载体之一。即使在中国内地，经历了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很打了几场大仗”（鲁迅语）之后，文言文也并没有立即销声匿迹，在整个二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内一直有反复、有回潮，更何况是在当时思想相对保守、守旧势力相对强大、新文学力量相对薄弱的南洋地区呢？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当年发生在南洋地区的这场“文白之争”时，应当承认，以《新国民日报》为代表的南洋地区白话新文学阵线，在当年那场文学语言的“革命”中，急进而又讲究分寸，“中庸”而又不失立场的做法，未尝不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与选择。（如上所述，尽管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能够证明我们这种判断的有力证据，便是在进入下一个文学时期（华文新文学的发展期，1925年至1933年）之后，南洋白话新文学不但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高潮时期，而且在语言现代化的程度上，也与中国大陆内地保持了基本同步的节奏，即：白话文开始逐渐确立了其在南洋文坛上的一统天下。无论对于南洋华文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对于整个二十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而言（因为南洋华文文学实际上就是整个二十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源头与第一个实体），这都是一个具有重大开创性意义的历史贡献。

二、文学语言的“脱胎换骨”

(一) 语言演变的轨迹之一——报刊发稿

作为南洋地区白话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以《新国民日报》为代表的各家华文报刊在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大力提倡与推广，不但顺应了当时时代的潮流，而且也大大加快了早期南洋华文文学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众所周知，作为现代华文文学的双翼之一，华文文学语言的现代化，与华文文学内容的现代化，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我们今天判断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的水平高低或发达程度时，语言标准往往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正如文言文曾是旧文学的主要载体与物质外壳一样，白话文理所当然地早已成为现代华文文学的主要表达工具。关于这一点，早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初，即已明确无误地获得了整个新文学阵营的共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其一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其二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自那时起，白话文和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轨道上并行的双轮，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与错位。

白话文和新文学作为形式与内容的双方，既有互相依存的一面，又有彼此独立的一面。在中国，早在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曾兴起过白话文运动。如果追溯到清末黄遵宪等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白话文的萌生发展历史就更为久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则曾将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统统包括在其中。在当时南洋，虽然没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传统与丰厚的文化积淀，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白话文的产生与出现，绝不在1919年10月以后，而肯定是在此之前。

翻阅1919年10月（这个时间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界公认的南洋华文新文学的诞生标志，即：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同时创刊）以前的南洋各报，除去《益群报》自1919年8月16日创刊的《新小说会》之外，其他如《国民日报》、《叻报》、《檳城新报》等，均可以发现白话文的作品。虽然这些白话作品（主要是小说）数

量很少，质量也不高，但毕竟已是完全不同于文言文的“新”作品。

然而，无论是1919年10月以前的白话作品，还是1919年10月以后的白话作品，与后来真正成熟的白话文学相比，尤其是与当时中国内地的白话新文学作品相比，差异都是非常明显的，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白话新文学在南洋地区发展、进化的艰难与曲折。

1920年6月22日，《新国民杂志》上发表的白话新小说〈富贵婚姻的恶果〉（作者“达纾庵”），是一篇反映妇女题材、反对包办婚姻的反封建小说。在当时已可算作较为成功的作品。小说描写上海女子金素珍与心上人岑英自由恋爱，但父母非要她嫁给门当户对的上海富豪李祝三之子。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这样描写的：

（因为金素珍坚持不嫁），整天整夜的哭，伊的姨氏、舅母、婶娘，来劝她，女士理也不理。还是秦氏（笔者注：金素珍之母）说道，你今年幼无知，不谙世故人情，拘执己见，你要知道父母苦心，岂真只关自己？无非为你罢了。现在你是不知，等上了年纪，才能分别出来呢。素珍私道，这两句话，倒还可以听听。又想我与岑英，虽是情投意合，终还没有缔甚信约，如果父母并不强制执行我的婚事，那么当然与他结婚。但我如今受了环境压迫，更无援助的人，如有有约，此时不能食言，惟有牺牲我命。现在既无信约，毅然牺牲了，我亦无名。我今不如权受这番，等到结婚以后，再随我的缘分而定。

.....

伊过门三日，新郎夜夜外宿，仔细打听，才知是个因嫖染毒，遂成阉寺的废物。不觉叹道，我的父母，简直拿我送在坟坑里边来了，还有什么生趣。那天晚上，更深人静的时候，取了一付金钏子，一粒一粒吞下腹去，笑着落了几点眼泪，说道，父亲每说我过门便可享福不尽，我今真个要去享福，永世没得烦恼呢。

以上内容中的旧小说痕迹十分明显，如叙事人称的混乱颠倒，对话、

行动、心理描写的随意处置，叙述主体与描写对象的界限模糊，等等，姑且不去论它。仅就作品语言来看，文白交揉的印记也十分鲜明：“素珍私道”、“缔甚信约”、“如有有约”、“惟有牺牲我命”、“我今不如权受这番”、“因嫖染毒，遂成阉寺的废物”、“不觉叹道”、“拿我送在坟坑里边”、“父亲每说我过门便可享福不尽”、“我今真个要去享福”。我们摘录这些词组，有两个用意：

其一，这些词组均有着明显的文言文痕迹，与真正的白话文相比，尚有颇大的差异。实际上，这是一种由文言向白话过渡时期的“白话文”。

其二，这些词组，实际上是这篇小说后半部分描写的重点词与关键词。把这些词组串连在一起，整个故事的情节基本上也就勾勒出来了。而恰恰是在这些最关键的描写部位或叙述部位上，作者运用白话文的能力最薄弱，最感词不达意，只得借助于文白交揉的句子来突出小说的重点与主题。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白话文尚在形成、发展之中，尚嫌稚嫩，尚未成熟。

即使连这样较为成功的白话小说中，也留有如此明显的文言文学的痕迹，这就深刻地说明，向沿袭几千年的文言文学挑战并建立崭新的白话文学，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文学语言“革命”，是一场需要“脱胎换骨”才能真正完成的文学语言的创新。

在“文白之争”中与《新国民日报》持同样激进态度的《益群报》，它虽因较早的发表白话新小说而成为南洋地区白话新小说的先驱者，但在《新小说会》创刊之前，它也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由文言到白话的文学语言过渡时期。

1919年3月24日（星期一），《益群报》创刊。创刊号上的文章，全部使用文言。文艺栏内发表的两篇小说〈读报〉（作者“钝民”）和〈梦侠情禅记〉（作者“江南吴佛徒”）均为文言小说。

1919年7月11日，该报〈教育部〉栏目发表著名五四作家叶绍钧的〈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此文既非文学作品，又非理论文章，只是叶氏谈论当时中国小学教育界的一篇杂感而已。但在该报提倡运用白话文方面，却有重大意义。此文已经完全采用通俗、流利的白话，对于当时该报所发

表的其他文章、文学作品等，均有一种示范作用。开头一段这样写道：

我是个小学教师，小学教育界的情形，当然比他人晓得的详细些。就我所晓得的情形而论，竟可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好现象纵不是没有，也只有二、三分罢了。因此感喟频兴，思潮起落，觉得非“改弦更张”不可。这篇文章，一半算是我自己和一部分小学教师的忏悔，一半算是“改弦更张”的一个“楔子”。但愿读者“不以人废言”，将篇中所述，审察一番，便是作者无上荣幸了。

正如该报在《新小说会》创刊之际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著名五四作家杨振声所写的〈一个兵的家〉一样（发表杨氏的小说的用意，正是为了让以后的作者们学习模仿），该报此时发表叶氏的文章，显然也有让作者们模仿的用意。叶氏既是教师，又是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他的白话文章，规范，通顺，流畅，成熟。这样的白话语言，当然是足资初倡白话文阶段的南洋作者们学习的。

此文发表之后不久，7月28日，该报的〈小说界〉即发表了第一篇完全白话的小说——“时事新小说”〈一段〉，作者“络宝”。作品描写当时商界的情况，以两个商人对话的形式写成，作品语言已是较为通顺、流畅的白话。这距离该报的创刊，不过刚刚四个月的时间，充分反映出该报在当时积极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急切心情。此时的《益群报》，正处于创刊《新小说会》的前夕，理论上宣传提倡白话文的意识尚十分强烈。就在发表此文的同一天、同一版上，编者特地开辟了一个〈新文学〉专栏，开始连载另一位五四风云人物傅斯年的理论文章〈怎样做白话文〉。上所述的叶绍钧的文章及傅斯年的此文，连续刊载了多日，直到八月上旬。

接下来发生的，便是八月中旬《新小说会》的创刊。《益群报》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的活动，终于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早期南洋文坛白话新小说的历史，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对于《新国民日报》、《益群报》这样态度激进的华文报刊来说，实

现文学语言的“革命”，虽有波折，亦有反复，但毕竟因为它们的立场和观念从一开始即站在新思潮、新文化、新文学一边，在运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方面，并无过大的阻力与困难，只是具体地学习、掌握这种全新的文学语言需要一定的过渡期而已。而对于像《总汇新报》、《槟城新报》、《叻报》等态度相对保守的华文报刊来说，以白话取代文言，实现文学语言的“脱胎换骨”，就真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语言革命”了。不但有困难，有阻力，而且经历的过渡时期也远较《新国民日报》、《益群报》等长得多。考虑到这些华文报刊对白话新文学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与态度：有些持中立立场；有些持消极立场，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有些则持讽刺、挖苦、甚至对抗、反对的立场；而且在长达五年多的华文新文学初创时期，它们各自的立场与态度也不断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创作上，它们均不如《新国民日报》、《益群报》那样积极和努力。对于这些华文报刊而言，可以说，“文白之争”、文学语言的“脱胎换骨”贯穿了它们在本文学时期内从头至尾的全部发稿过程中。直到本文学时期结束，进入了下一个文学时期——南洋白话新文学的发展期（1925年至1933年）之后，这些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才既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又在文学技巧及表现手法的运用上，基本具备了现代白话文学的艺术规范，才逐渐与南洋文坛上积极提倡白话新文学的《新国民日报》、《益群报》等华文报刊的白话文学作品基本上处于并驾齐驱的艺术地位。这个文学史实，深刻而有力地反映了当时发生在南洋地区的这场文学语言“革命”的艰难与曲折。

（二）语言演变的轨迹之二——作者投稿

在本文学时期内，文白之争，文学语言的革新与演变，不仅发生在当时南洋各家华文报刊的文学作品发稿过程中，甚至也发生在作家个体的创作实践过程中。

前已述及，《新国民杂志》的主编张叔耐先生，就是一位擅长古文的作家。当然，他用白话所写的文章、编者按语、社论消息等等，也十分漂亮。作为白话文学的倡议者，他的这种身体力行，为当时的许多古文基础

深厚坚实的作家们作出了表率。在这方面，我们以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莫过于当时南洋地区的著名作家曾厚禄先生。

1919年10月之前或之后，厚禄均发表过多篇小说（此外，他还写过许多散文、评论及诗歌等等），其中大部分是文言作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擅长旧文学的作家，在1919年10月以前，却也发表过白话小说。他的〈蛙鸣〉曾先后在《叻报》和《檳城新报》上发表过（分别见1919年8月27日《叻报》与1919年9月25日《檳城新报》），全文如下：

国国国……国国国，一片很凄凉的蛙声，震了行人的耳鼓。这时候，天也将近黄昏了。

国国国……国国国，——这一片的蛙声，正在国的了不得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头戴箬笠，身穿棕蓑的农夫，听见了这一片国国国……国国国……的蛙声，怒得了三尸神暴跳，七窍里生烟。遂大口道，蛙呀，你不要国，也就罢了。若是要国，我就将你捉去炒烧酒咧。

（蛙）国国国……国国国……我偏要国，任你将我捉去炒送酒，却是我的甘愿呢！

（农夫）蛙呀，我好话劝你不要国，你说偏要国，你是当真不怕死的东西吗？

（蛙）国国国……国国国……我若是怕死，什么样子不听你的话，国得这般的狠呢？

（农夫）蛙呀，你真不懂世事了。怎么缘故，性命也不惜，偏偏要国呢？

（蛙）国国国……国国国……我死也要国。国国国……国国国……

（农夫）你死也要国，好呀，看我的手段。说罢，便就将了这群蛙，捉入笼里，走往自己家中去了。

这群蛙，虽然在了农夫的笼里，也是一味国国国……国国国……。

读罢此文，笔者想起了五四时期周作人所写的白话诗〈小河〉。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传达出一种个性解放、张扬自我、平等自由的人道主义精神。虽然厚禄的这篇小说在艺术及思想内涵上不及〈小河〉，但就其文学语言而论，已是较为通顺的白话。这一点是极具文学史价值的，尤其其它发表于1919年10月《新国民杂志》创刊之前。

1919年10月以后，厚禄发表的文学作品更多。仅以《新国民日报》上的小说为例，即有“时事短篇”〈窈人一席谈〉（1920年1月8日）、“社会短篇”〈侠丐〉（1920年2月3日）、“滑稽小说”〈笑报〉（1920年6月16日至6月21日）、“奇情短篇”〈嫩馨复仇记〉（1920年9月15日至9月27日）、“社会短篇”〈新年初一底乞儿〉（1920年11月3日至11月4日）、〈一个劳工底厄运〉（1921年6月23日至6月24日）、〈在陈绝粮〉（1921年9月19日至9月20日）、〈子路打虎〉（1923年8月25日至8月28日）。其中四篇文言，四篇白话。从1920年底的〈新年初一底乞儿〉开始，厚禄发表的小说全部改用白话创作。

比较一下这位由文言小说转而从从事白话小说创作的作家前后两类不同作品的语言运用情况，很有意思，亦颇能给人以启发。

1920年11月3日至4日发表的“社会短篇”〈新年初一底乞儿〉，描写了几个乞儿在新年时用行乞所得的钱去戏院买票看戏。虽遭卖票人的刁难，但最后还是如愿以偿。是一篇典型的鼓吹平等自由、人道主义思想的平民小说。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描写：

“你是个乞儿，为何也要看戏呢？”（卖票人）

“我虽是个乞儿，但我有铜元，也是和那富商大贾囊中所有的一样，难道我有钱，竟看不得戏吗？”（乞儿）

“你当真要看么？”（卖票人）

“我一定要看！”（乞儿）

“要看你去看罢。”（卖票人）

再看行动及心理描写：

那卖票人一面说，一面气勃勃地把那票掷与他（笔者注：“掷与他”还可看出文言痕迹），好像个施舍的一般。众乞儿拿了票（笔者注：“众乞儿”也可看出文言痕迹），也不和他计较，便慢慢地向着戏院里面走进去。嘿，可怜乞儿几十个千辛万苦所得来的铜元，白白地断送去了，然乞儿倒没有一点儿的悔意（笔者注：“然”字显然也是文言的用法）。因为他们平素不曾看过戏，这一回，可算是破题儿第一遭了（笔者注：“破题儿第一遭”也是文言用法）。众乞儿越看越欢喜，虽平白地拾得银币，也没有这样地愉快啊？

以上两段描写，无论写对话，或写人物行动及心理活动，均可看出作者的文学功底十分老道。同样，也可看出作者所用的语言中文言文的痕迹尚十分明显，是一种处于“脱胎换骨”期间的过渡性“白话文”。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就在两个月之前，作者所发表的另一篇地地道道的文言小说《嫩馨复仇记》中，是如何运用文言文进行对话描写及行动心理描写的：

时籟庵适在其别墅，摊书检阅，见嫩馨至，爰急起而笑迎之，旋睹其玉容瘦削，大异昔时，最可哀亦最可怜，乃以温语慰之曰，尊翁之死既死矣，妹亦宜稍自节哀，则泉下人有知，当亦含笑于九京，且吾闻县令固神于治，以予付之，不久定能枭彼刺客之首，而为吾妹雪此莫大之仇也。嗟夫籟庵，汝之奸谋，早已被人洞破，乃汝犹喋喋作此假猩猩之狡语耶。嫩馨唏嘘曰，已矣籟哥，人谁不死，唯吾父之死，竟埒诸鸿毛，为可伤耳。然妹旋思徒伤亦属无益，故日来之悲，已少杀矣。籟庵曰，妹能若是耶，则予心得稍慰耳。言已亟握其兜罗锦之手，以表示其赞成之意。而嫩馨此时，亦不觉于恨仇仇海中，为之露一最可怜之笑容焉。

既而复谓籁庵曰，吾闻查岬山风景，不灭山阴，妹意与哥，一登临之，籍抒愁怀，不知哥其许我耶。籁庵领之，遂偕往焉。

这段文字，足见作者的艺术功力和古文功底。他运用文言状物写人，进行对话及动作描写等，均已达到非常纯熟自如的地步。而用白话，则逊色了许多。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这里：为什么他抛弃了擅长的文言文，改用并不擅长的白话文进行创作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可以根据当时报纸发表作品的情况推断出来的：

第一，它说明，在当时使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已渐成风气。除了一般的作者及报纸均使用白话以外，读者也开始更多地接受与欣赏白话文学作品。读者从来都是报纸与作者的上帝，读者的这一需求，显然是厚禄运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的一大动因。

第二，如前所述，1920年底前后的《新国民日报》上，提倡推广白话文的理论文章，已对白话文的运用进行了大量宣传，在发稿方面，白话小说的用稿量亦日见其增。为了响应该报的号召，顺应这一潮流，小说作者在向该报投稿时，亦会因此采用白话进行创作。

第三，在当时中国内地，报刊杂志使用白话已经蔚然成风。身为南来作者的厚禄与当时南洋的绝大多数华文文学作者一样，和中国大陆一直保持着血肉般紧密的联系（这也正是本文学时期内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因此，他于此时决定弃“文”用“白”，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四，除去以上的客观原因之外，从作者的主观上看，他也只有使用白话进行创作，才能不落伍、有读者，才能随着时代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前进。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在使用白话文创作时，尚不如文言文那样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尽管他的白话小说中还有许多明明暗暗、或多或少的文言文痕迹，但他终于顺应时代的要求，选择了白话——“文白之争”在这样一位颇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身上，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厚禄由文言转向白话的创作轨迹，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亦有广泛的

代表性。它深刻地说明，在当时的南洋地区，这场提倡白话文的文学语言“革命”，已不仅仅是对每位文化人乃至普通读者的一种文学上的选择或适应，而且也是人们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前进的脚步面前必须作出的一种文化的、美学的、历史的抉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至少就文学语言而言，就我们所要论述的本时期南洋地区的华文文学而言，在其实现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它已成为一条重要的价值取向标准——这大约就是当时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文白之争”的真谛吧。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回顾近一个世纪之前发生在南洋土地上的这场中国国境之外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我们看到了以下事实：

无论激进也好，保守也好；赞成支持也罢，反对打击也罢，在以《新国民日报》为代表的南洋各家华文报刊的提倡推广之下，白话文和新文学犹如漫山的野火一样，终于在早期南洋的这片土地上越烧越旺，从萌芽、诞生，到发展、成长，时代的潮流终于是无法阻挡的。经过了华文新文学的初创期之后，到了下一个文学时期（华文新文学的发展期，1925年至1933年），白话文学不但理所当然地成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的正宗和主流，而且由于这种文学语言的创新活动及大大普及，对于当时华文报纸其他版面和文章的影响与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文学作品中白话文水平与比重的不断提高，华文报纸上除文艺版面之外的其他版面和文章的语言，也同时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性质演变。因此，到了下一个文学时期，当白话文逐渐确立了其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之后，南洋华文报刊上的所有版面、所有文章实际上也逐渐完成了这种文章语言的革新。这一部分语言的革新、演变历史，虽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但是，实现这种语言转变和定型的历史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仍应当归功于本时期华文报刊上（尤其是态度比较积极的华文报刊上）所倡导、所进行的这场文学语言“革命”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南洋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白话新文学在南洋地区的逐渐萌生、发展及终成主流，确实具有十分广泛、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实现与完成了对以文言文为语言特征、以传统观念为

精神特征的旧文学的挑战与超越，为南洋地区的华文文学注入了全新的五四文学精神与时代内涵，从而启动了南洋华文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使之与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基本同步地步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的现代化时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学语言的革新与转变、文章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现代化过程），对于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南洋华语世界和华族社会不断实现现代化的世纪征程，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与桥梁作用，使其在多元文化结构、多元种族构成、多种语言文字的南洋地区，率先奏响了步入现代化社会的序曲，使得身居南洋地区的海外华人、海外华文没有落后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启动节拍，这是它的一项重要历史贡献。

从更加宽广、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发生于二十世纪初叶的南洋地区的这场“文白之争”，不仅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国境之外的第一个文学分支、第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第一轮对外辐射的冲击波；而且，由于南洋地区华文文学，其实也就是整个海外华文文学最早的文学实体与源头，实际上，白话新文学在南洋地区的萌生与发展，也就启动了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内逐渐走向世界的世纪征程。它不仅为其世界化过程奠基，而且从一开始，就在文学语言和文学精神、在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为二十世纪的整个海外华文文学注入了、奠定了五四文学精神这一最重要的基石。这是它的又一项更加重要的历史功绩。

参考书目

- 《檳城新报》、《叻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益群报》、《总汇新报》，1919年10月1日至1924年12月31日。
- 《新国民日报》〈七周年纪念专刊〉，1926年9月30日。
- 杨松年1990。〈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华文文坛〉。载《五四文学与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